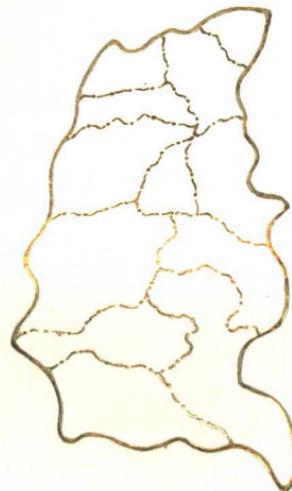


冀魯豫党史 資料选編

第二集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征集办公室冀鲁豫小组

冀鲁豫党史

资料选编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征集办公室冀鲁豫小组

目 录

湖西日报的始末	苗春亭 张一凡(1)
枣庄铁道游击队	王根培(40)
回忆抗日时期冀鲁豫军区沙区办事处的工作情况	
.....	王乐亭(50)
秘密交通线上的斗争	王化棠(66)
我党对丁树本部队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	孙汉章(74)
冀鲁豫军区的建立	张经五(78)
刘邓首长巧用兵 回马一枪夺鄄城	杜唐佑(83)
追忆我参加过的几次战斗	孙秉祥(87)
第二次陇海破击战役中攻克东明	张汝建(90)
湖西“四十八天”	刘航华(98)
鹿邑之战	毛时新(104)
奇袭伪乡公所——周庄	张兴鲁(111)
攻打白塔	林存信(115)
我们的游击兵工厂	程重远(119)
抗击敌顽 战胜灾情	明耀中(125)
回忆我在朝城时的艰苦斗争生活	陈照祥(131)
英雄虎胆“大将”苏海	王旭东(135)
忆女医生孟惠民同志	刘东来(142)

- 小老交通员王兴元 刘东来(146)
秘密运送油印机 任传庆(152)
在冀鲁豫抗战中的二三事 孟庆明(157)
单虞县的抗日斗争和汤楼战斗 时念贵(162)
强攻李庄 晁岱勤(169)
卫河水滔滔 杨砚田(175)
从参加儿童团到南下渡江 孙洪杰(195)

湖 西 日 报 的 始 末

苗 春 亭 张 一 凡

《团结日报》时期（1939—1940）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说：“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又说：“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办报纸就是做好抗战政治动员的手段之一。在此思想指导下，湖西抗日根据地，当时的苏鲁豫皖区党委便筹备办自己的报纸。

一九三九年初，那时的日本鬼子正忙于扩大占领区，对敌后方还未来得及进行大规模扫荡。我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处于大发展的阶段。当时我们的政策是组成广泛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敌人和汉奸外，对其他各阶层，凡主张抗日的一切人士，都认真的团结他们。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动员、组织群众团结抗日，并且交流工作经验，苏鲁豫皖区党委决定筹备出版一张报纸。经过一段简单筹备之后，于一九三九年三、四月分开始出版了两个版面的油印报——《团结日报》。主要是魏钦公同志负责，记得“团结日报”四个字还是魏钦公同志写的。那时魏钦公同志一边编报，抽空还亲自刻腊纸翻印《论持久战》，油印的《论持久战》印得又工整又好看。不久张涛（现名张一凡）同志从苏鲁豫支队军政干校（住单县城南王集，故又名王集干校）学习回来被分配到报社工作，以后又调来了徐斌、吴玉华等同志。

当时，各阶层群众抗日热潮很高，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地发展。油印小报不能满足形势需要，区党委又在想方设法搞铅印机，计划出铅印报。那时我们同沛县、丰县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关系还很好。由李贞乾同志向黄体润，董雪山借来四部铅印机，计有四开机一部、八开机两部、十六开机一部。这几部铅印机原属于丰县国民党县党部所有，他们曾出过《丰报》。不单借机器，连人也借来了。共借来五位老师傅，八、九位熟练工人，还有几位学徒工。印刷机和工人来后，开始安排在张花园，在张昌学同志家腾出几间房子把机器安装起来，排字盘也整理出来。一切准备就绪后，最初印点宣传品，以后就正式印了几本书，记得当时印过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还印过《社会科学概论》几

分册。这些书对湖西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的学习和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铅字印刷问题解决以后，在一九三九年的五、六月份区党委决定把油印的《团结日报》改为铅印报，报纸发行份数也由原来的几百份增加到几千份。记得在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十五日左右，为加强出版工作的领导，正式成立了苏鲁豫皖印刷局，一边印书，印宣传品，一边印报纸。这时印刷厂的负责人是张得臣、李宗元两位同志。

这时湖西根据地的抗日救亡活动处在大发展阶段。《团结日报》刚改铅印，报纸也是大发展的时期。正在这大好形势下，由于暗害分子王肃仁的破坏，在一九三九年的七、八月份，开始了错误的湖西“肃托事件”。在短短的时间内，把县以上干部，大部分都戴上莫须有的罪名，并杀掉了一大批。部分革命青年和一些人民群众，一时不敢靠近我们。有的临时躲开了。好端端的一块抗日根据地。被弄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这时《团结日报》被迫停刊，报社的同志也遭了灾难，区党委命令李宗元把正在正常运转的四部铅印机和排字房的铅字拆下来装在十多辆大车上，从张花园拉到丰县北，拉到郝寨，又拉到夏镇。李宗元同志找到在夏镇工作的主传珍同志请他给安排住处。还没站住脚，又叫从夏镇把机器运到谷亭，这时区党委机关在谷亭。十多辆大车拉着机器在谷亭转了几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住，又命令把铅印机装在船上，在湖里转，李宗元同志又去找主传珍同志要船，就这样几部铅印机装在船上在湖里打游击，根本无法展开工作。东转西转。从一九三九年的秋天，一直转到初冬，又拉

了回来，白白浪费了时间，就在这时，原来主持报社工作的魏钦公同志被戴上“托匪”的罪名，同其他遭暗害的同志一道被拉到谷亭镇外荒野去枪毙。其他几位同志都被打死了，魏钦公同志被打了一枪，从左腮穿到右腮，脸部被穿了两个洞，没伤到要害处，万幸没有死。他忍着痛苦咬着牙慢慢从刑场爬了出来，被当地一位老百姓藏在秫秸垛里，救了下来。

一天之内，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同志的事就有几起，凡是被抓起来的同志，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革命内部被暗害分子破坏，大伤了元气。国民党顽固派看有机可乘，四面向我进逼。这时，湖西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小，团结日报社住地——辛羊区，形势更为险恶。几乎没有了容身之地。东边有丰县的顽固派卜昭贵部经常到朱集，孟庙以东活动，西边有号称“七路”军的朱世勤部也向我根据地进逼，有一次他们一度驻进了张寨以南二、三里的小黄楼。

这时，从铜北到丰沛，从砀山到单县，可说整个湖西根据地处于敌、伪、顽四面向我围攻的态势。一九三九年秋铜山国民党顽军耿继勋（外号耿聋子）率部向我驻在千里井的抗日政府大举进攻制造了“千里井惨案”，我铜北办事处主任阎树棠，铜北党的负责人王惠清、张一民等同志和干部战士百余人被杀害。同年秋我单县辛羊区区长朱筱舫和其子朱德民同时被单县“七路”顽军杀害。一九三九年冬郭影秋同志在《吊朱筱舫父子》的诗中这样写道：“日伪顽军暗结防，湖西遍地是沙场。才悲铜北遭明劫，又痛辛羊中暗枪。微子东

横成跳板，黄河北绕固新疆。人民血化莫邪剑，荆棘劈开斩虎狼”。这首诗就是写那时的湖西局势的。

一九三九年冬，由于暗害分子王肃仁的破坏和“肃托事件”的影响，湖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处于动荡之中。

这时，区党委在谷亭一带活动，距离较远。团结日报社的同志便和单县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合作，决定恢复油印报，以便宣传群众，稳定群众情绪，同志们讨论了几次，有人提出叫《前线》报，有人提出叫《斗争》报，最后统一了看法，采纳了苗春亭同志的意见，取名叫《哨兵》报，是为应付紧张形势，报纸应作为党的哨兵的意思。于是，我们找到原来用过的油印机，在张寨附近办起《哨兵》报来，这时在报社工作的有张敏之、贾遵浩、张涛、徐斌、朱子鑫等同志。

《湖西日报》时期（1941—1945）

中共中央发现了湖西“肃托事件”的错误，于一九三九年底，派罗荣桓同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和郭洪涛、张经武等同志一起亲临湖西，释放了大批遭受暗害分子王肃仁迫害的革命干部，逮捕了王肃仁，制止了湖西肃托事件的发展，挽救了危局，一九四〇年春天，正式恢复“团结日报”铅印。一九四〇年底，中共中央派潘复生同志到湖西工作。这时苏鲁豫皖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地委决定将“团结日报”改为“湖西日报”。由地委宣传部部长郝中士同志兼社长，鲁奇

同志任副社长，李合力、苗春亭、李冰同志任编委，刘平林、张涛等同志是编辑兼记者，赵勉同志任校对。那时编辑和记者是不分的，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久，上级又派来金彩凡、魏侠两位女同志到报社当记者。

湖西地区，处在徐州、济宁、归德三角地带，南边是陇海铁路，东边有津浦铁路。再加微山湖水相隔。地形对我十分不利。坚持湖西地区的抗战。是极其艰苦的。敌、顽、我三方犬牙交错，斗争十分激烈。本文不打算叙述这方面的情况。关于报纸的内容也不打算多讲，只就当时的工作情况作一些简略叙述。

编 辑 工 作

报纸的稿件，一部分是新华社的电稿。这是最重要的稿件。新华社的电稿。及时传播党中央的指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这是敌后党政军民一日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另一部分是地方稿件。包括地方新闻、通讯、社论、文章，以及工作调查研究、文艺作品等等。主要依靠全党动手，群众办报。党、政、军、民负责同志都给报纸写文章、写社论。例如一九四〇年夏天。湖西专署成立时，郭影秋同志就写了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社论。湖西地区形势如何？敌、顽、我斗争态势如何？当前的斗争任务是什么？如此等等，都是全区抗日军民经常关心的问题，湖西日报要及时的加以报导和分析。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的精神，对湖西日报有重大的影

响。编辑部非常强调调查研究，学习群众语言，用群众语言反映群众生活，努力办成为群众所需要的和通俗易懂的报纸。这时报上发表了不少篇尚格东等同志写的关于农村工作的调查报告。当时不少编辑和记者，在同群众接触中，经常收集、记录群众中生动的语言、成语、歇后语等，以丰富自己的语言，这对改造湖西日报编辑人员的思想和文风，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的工作条件是很艰苦的，居住无定所，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迁，在老百姓家里住，随便找个小桌子或找几块木板架来起就是编辑部办公处。晚上用的小油灯。那时钢笔很少，多是用毛笔，有时找块铜片自己制作一个蘸水笔。写字没有正规的稿纸，随便裁点纸当稿纸。排版更难，连字数都是编辑一个字一个字的数清，大约的划个版样交编辑同志去写版。一九四五年冬，报社在鱼台城北住时，张涛同志在日记上这样写了几句打油诗：“北风凛冽刺骨寒，油灯少油灯花残。一版小报编排好，三星已挂正南天。”工作条件虽然很差，同志们干起工作来心情都非常愉快。

记者采访和通联工作

当时，编辑部专业记者很少，但通讯员很多，编辑部设有通讯联络科，专门和通讯员联络。这是报纸的一个重要稿源，也是办好一张报纸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记得当时有通讯员二三百人，骨干通讯员有三、四十人，象主传摸、张仁龙、王传忠、朱本正、李延素、刘震、蒋海燕、韩朝阳、尚

格东等同志都是报社的骨干通讯员。他们来稿多，质量好，报社通讯科经常同他们联系，指导写作，那时没有稿酬，只凭一股革命热情为党报写稿。为了提高写作质量，通联科不定期的印点有关如何写作的资料，文章供通讯员参考。

记者采访，那时没交通工具，只凭两只脚徒步前往。一九四二年由于天灾，敌情严重，造成生活困难，毛泽东同志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报社听说郭影秋专员在王小庄附近带头人拉犁帮助群众生产。报社就派记者一块去同郭影秋同拉犁耕地。这样采访和写出的稿件，既生动又具体。为了报导劳动模范的事迹，就派记者同劳模同志一块吃住和劳动。这样写出的报导和通讯，一般水平都是比较高的。

一九四四年秋天，铜北国民党顽军头目耿聋子，对根据地破坏扰乱太严重了，他们抓住我们的干部，不是用铡刀铡，就是放天花（把人活埋时土拥到脖胫，全身血液向上涌，用刺刀向头上猛刺，血喷一丈多高），工作无法开展，群众义愤填膺。这时冀鲁豫军区派骑兵团配合湖西分区部队组织“东进讨顽战役”，报社派张涛、刘鸿儒同志随军采访。这时高粱正晒红米，步、骑兵配合，把无恶不作的耿聋子顽军真是杀得落花流水。骑兵的大刀飞舞，顽军抱头鼠窜，追杀几十里路，被斩、俘无数。沛县一带的老百姓真高兴极了，沛县妇女烙单饼有专长，又快又薄，群众纷纷烙单饼、杀猪、宰鸡慰劳部队。记者访贫问苦，开各类座谈会，整整忙了几天几夜。收集了无数第一手材料，群众诉顽军的苦，记

者常被感动得流泪，带着对群众的同情，对敌人的仇恨写作，写消息、写通讯，源源送回报社、声讨了顽匪的罪行，鼓舞了军民的斗志。

记者少的情况下，只有组织重点采访。大力组织通讯员网的工作，这是当时保证稿源的重要经验之一。

电 讯 工 作

湖西日报时期，报社有部电台，收新华社的电讯。新华社电讯及时报导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布了党中央的指示，这是湖西日报的主要内容。这部电台是地委的《湖西日报》和分区的《火线报》合用的，电台多数时间跟报社活动，有时跟分区活动。一九四二年，报社住田老家时，电台就住在村南头的瓦屋里。报社随地委活动时，不论行军再远再累，都是首先给电台找房子，电台的同志第一项任务就是找地方架天线，收拾好收报机，准备收报。当时的电台队长是潘洪泽同志，收报员有徐世忠、安方合、牛射奇三位同志，译电员有：单衍荣、姚近水、牛本安三位同志。

那时的具体工作情况是：如电台跟湖西日报社活动时，朱本安、姚近水到报社来取电稿。如电台跟分区活动时，岳修山、李善长、张玉合同志便到分区去取电稿。有一段电台跟九团活动，这一段不长。那时九团的团长是何光宇同志。电台工作条件很苦，特别是冬天，零下一、二十度，又没有取暖的条件，抄报有时冷得手拿不住铅笔。每天在小油灯下工作到半夜。有一段时间，抄报纸一点都没有了，就在地主家

找几本古书，拆开后翻过来写，就这样维持了十多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家都很敬爱的岳修山同志，他已有四十多岁了，没结过婚。那时我们的报纸，石印两三千份，一周两期，每期捆起来就是几捆，地委交通科负责发报，每次到交通科送报，到电台取电稿，都少不了他。不论黑天半夜，不论刮风下雨，他背着沉重的报纸，来往的跑着，从没耽误过事，你问他累不？他只是笑笑，他平时很少说话，象老黄牛一样默默地工作着。

缮写和印刷工作

出石印报时，有个缮写组。先后在缮写组工作过的有：王秋岭、杨明奎、杨步胜、单衍忠、尉庆臣、周玉启、寻玉泉、马毅、宋德裕等同志。

缮写的工作条件也很差，住在老百姓家，屋里一般光线都很暗。常是四个人围着一张八仙桌写字，每人占一边，肘碰肘，夏天热得汗流浃背，冬天冻得手拿不住毛笔，冷极了，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或跳一阵回屋再写。电报来晚了，编辑和缮写都要忙到下半夜。

为了便于隐蔽和转移。地委决定报纸由铅印改成石印。第一部石印机是从敌占区通过关系弄来的。最早从沛县弄来一部，以后又从专署调来一部，成立了石印组，由常敬吾、王友明负责。先后在石印组工作过的有：曹银庆、莫云武、赵树良、刘进宝、李效敬、贾学纯、彭荣亨、燕宪武、孙增法、孟昭启、时盛秋等同志。

石印用的纸张和油墨，缮写用的药纸和药墨，调墨和洗刷机器用的汽油，根据地里没有，这些物品都要通过关系到敌占区去买。经常帮助报社买东西的有齐俊岚、刘铭盘等人，他们多是从单县、金乡、徐州、商邱等城市人托人地把东西买出来。办这种事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包括一些党外朋友，都为此担当了很大的风险。由此可见，办一张报纸，是依靠了各方面的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一齐出了力。东西买来后，怕敌人扫荡时丢失，想了个办法，挖地下室埋藏。记得报社住刘新庄时，辛霞光和郝承志两同志，在他们住的床下自己动手挖了一个洞，一人多深，一丈多长，把纸张等物藏在里边。

石印机，工作起来声音响，目标大，敌人来了不好隐藏。大家想了办法，挖地下室。最早的地下室是一九四二年石印组在白楼住时挖的。挖一、二丈深，上面用木棍和秫楷搭起，再用土封好，上边再用秫楷、豆楷等加以伪装。边上留一个只能一人上下的门，工作当中和工作以后把小门进行伪装，外边看不到灯光，也听不到声音。工作起来安全多了。这样的地下室曾经挖了几处。根据环境的变化，时儿在这里，时儿在那里，使敌人侦察不到我们印刷报纸的地点。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大扫荡时，石印组从权庄搬到马桥，以后又从马桥搬到孙楼。住孙楼时，形势不太紧张，就在屋子里印刷。住了几个月后，又从孙楼搬到黄堆集南的赵新庄，不久又搬到秦庙。住秦庙时又挖了地下室，在地下室印报。元月二十一日大扫荡时，李贞乾专员在马桥牺牲，那时石印

组正住离马桥不远的秦庙。这时地下室已经有了汽灯照明，比油灯好多了。敌人来时，把洞一关，工人就随当地老百姓躲了。有一次险极了，工人刚从地下室出来，正忙伪装洞口，敌人从秦庙的村边过来了，工人混在人群中躲过。秦庙东边七里多路是刘新庄，那里住着报社的编辑部。敌人扫荡以后，石印组从秦庙搬到西南方向七、八里路远的谢油坊，又重新挖好地下室，照常开机印报。

一九四三年的夏天，高粱已长半尺多高，环境又趋紧张。日本鬼子在离谢油坊几里路远的王寨、常坑修筑了碉堡，在谢油坊坚持印刷工作有困难了。这时报纸又改出油印版。工人自己挖坑，自己搬运，一直忙了七、八个晚上，把石印机、纸张等埋在谢油坊的村外抗日沟边上。两三个月后，又悄悄的把石印机挖出来，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继续出石印报。那时石印组的负责人是李宗元同志，他在报社铅印厂、在石印组一共工作了五年，工作非常负责，多次搬运、埋藏机器，没有丢失过一点东西。是印刷组的一位好领导。

在战争环境里，报社印刷组光靠地下室的隐蔽是不能坚持工作的，主要靠的是同群众的亲密关系。全体印刷组的同志，一进村就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同全村老乡，特别是同房东搞好关系。住张花园时，同房东张昌学家的关系非常好。昌学同志以后参加了工作，昌学同志牺牲后，他家的大嫂子和孩子们对我们仍然特别好，我们离开张花园后，大嫂子还经常派小孩给工厂的同志带些土特产来。住孙庄时，和

房东的关系也特别好。工人孙增法同志就是房东孙大娘的儿子。孙增法参加工作跟我们学石印。增法同志的母亲帮助我们做饭。石印组从孙庄搬到秦庙，孙大娘仍离开家到秦庙继续帮助我们做饭。住徐庄时，房东老大娘的儿子、侄子都参加了工作，他们自己挤着住，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用。当我们离开七、八年后，老房东见了仍很热情。总之，没有同群众亲密的鱼水关系，在那样紧张的战争环境里，坚持印刷报纸是不堪设想的。

党的领导和行政管理

当时报社，除有社长、副校长的行政领导外，还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编辑部和印刷组分别编有几个党的小组。当时的支部生活比较健全，一般都能保证一周过一次小组生活会，每个同志经常检讨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学习，同志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很好。党员有什么想法，都能坦率地谈出来。党内生活的健全，保证了行政任务的完成。

报社还设有行政管理科，科长是辛霞光同志，副科长是王友明同志，赵恒珠同志任总务股长，燕守田同志任事务长，炊事员有张月轩、张素仁等同志。辛霞光和赵恒珠同志，在组织后勤供应，管理机关生活方面，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特别令人怀念的是办报社伙食的燕守田同志，他是沛县人，那时他已有四十多岁了。在那种战争环境里，能把伙食办好，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大家生活都很苦，常吃高粱窝窝头。情况紧张时，吃不上饭的时间也有。燕守田同